

刘永佶 著

ZHENG ZHI JING JI XUE
FANG FA LUN SHI

政治经济学 方法论史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

刘永信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

刘永信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 15.875 印张 412 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 7-5035-0079-4/F·12

定价 5.20 元

目 录

导 论	(1)
一、方法论在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	(1)
二、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演化的历史阶段	(4)
三、研究方法论史的现实意义	(9)
第一篇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13)
第一章 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渊源	(15)
一、古希腊思想家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	(15)
二、阿奎那的演绎法	(22)
三、重商主义者的经验总结法	(26)
第二章 初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方法	(31)
一、配第的归纳法	(31)
二、布阿吉尔贝尔的方法	(34)
三、魁奈的研究方法	(37)
四、休谟的经验主义怀疑论方法	(41)
第三章 斯密的二重方法论	(45)
一、“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方法	(45)
二、现象描述法	(49)
三、《国富论》的论述体系	(52)
四、斯密二重方法论对后世的影响	(56)
第四章 李嘉图对斯密抽象法的继承和发展	(60)
一、继承中的批判和发展	(60)
二、力求揭示经济运动的内在联系	(62)
三、《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论述体系	(67)

四、李嘉图抽象法的缺陷	(69)
第五章 西斯蒙第对抽象法的贡献	(73)
一、独特的社会经济观点	(73)
二、在揭露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中对抽象法的发展	(77)
三、西斯蒙第方法中的消极成分	(81)
四、《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的论述体系	(84)
第二篇 早期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89)
第六章 马尔萨斯对抽象法的“批判”	(91)
一、没落地主阶级意识的反映	(91)
二、辩护论的“定义”方法	(94)
三、对主要经济问题的庸俗见解	(97)
四、对李嘉图体系的批判	(100)
第七章 萨伊对现象描述法的发展	(104)
一、萨伊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论述	(104)
二、现象描述法在萨伊手上的系统化	(108)
三、以“三分法”建立的论述体系	(113)
四、萨伊在政治经济学庸俗化中的作用	(115)
第八章 李嘉图学派解体过程中的方法论	(118)
一、李嘉图学派解体的方法论原因	(118)
二、詹姆士·穆勒从形式逻辑对李嘉图体系的“修正”	(121)
三、麦克库洛赫进一步庸俗化的方法	(128)
第九章 庸俗方法论的系统化	(130)
一、庸俗方法论的特征及其系统化的条件	(130)
二、西尼尔把心理因素作为论证的前提	(134)
三、巴师夏所谓“和谐”的方法	(137)
四、约翰·穆勒的“集大成”	(140)
第十章 历史学派的“历史的方法”	(144)
一、“历史的方法”的突出历史地位	(144)
二、李斯特“国家经济学”的方法	(146)
三、罗雪尔对“历史的方法”的发展	(153)

第三篇 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确立	(161)
第十一章 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初级形态	(163)
一、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发展	(163)
二、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影响	(167)
三、对以前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	(170)
四、初级形态的科学抽象法	(175)
五、异化劳动假说的体系	(179)
第十二章 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发展	(184)
一、严格的批判态度和深入研究	(184)
二、基本经济观点的形成及其与方法论的相互制约	(186)
三、关于科学抽象法的论述和运用	(190)
四、《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演化	(195)
第十三章 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成熟形态	(200)
一、科学抽象	(200)
二、以概念运动为主体	(205)
三、《资本论》的论述体系	(208)
四、研究方法和论述体系的统一	(212)
第十四章 恩格斯对科学抽象法的贡献	(216)
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	(216)
二、注重调查研究	(220)
三、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目的的规定	(222)
四、对科学抽象法的奠基和论述	(225)
第四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应用和发展	(231)
第十五章 考茨基对科学抽象法的传播和运用	(232)
一、《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方法和体系	(232)
二、《剩余价值说学史》的编辑和出版	(235)
三、对土地问题的研究	(238)
四、在帝国主义问题研究中的方法错误	(242)
第十六章 帝国主义研究中科学抽象法的应用	(247)
一、希法亭《金融资本》中的方法	(247)

二、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	(252)
三、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的方法	(257)
第十七章 列宁对科学抽象法的运用和发展	(263)
一、对科学抽象法的深刻理解	(263)
二、对俄国资本主义特殊规律的揭示和论证	(267)
三、《帝国主义论》的方法和体系	(270)
四、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方法	(275)

第五篇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方法论	(281)
第十八章 以“心理原则”为基础的方法论	(283)
一、对“心理原则”的片面强调	(283)
二、从门格尔到庞巴维克	(286)
三、马歇尔对“心理原则”的系统化	(291)
四、《经济学原理》的体系	(294)
第十九章 数理学派的方法论	(299)
一、数理学派方法论的特点	(299)
二、杰文斯对数学方法的重视和运用	(301)
三、瓦尔拉对交换的数学分析	(306)
四、帕累托对数理经济学方法的贡献	(310)
第二十章 从新历史学派到制度学派	(315)
一、在“主流派”外独树一帜	(315)
二、施穆勒的“历史归纳法”	(317)
三、凡勃伦研究“制度”的方法	(322)
四、康蒙斯以论证“法制”为核心的方法	(326)

第六篇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论 (333)

第二十一章 凯恩斯的“革命”及其“总量分析法”	(335)
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转折	(335)
二、“总量分析法”的内容	(338)
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体系	(342)

四、凯恩斯方法的缺陷	(346)
第二十二章 分化了的凯恩斯学派的方法论	(348)
一、凯恩斯学派的分化	(348)
二、新古典综合派的方法	(351)
三、新剑桥学派的方法	(355)
四、分化中暴露出来的方法问题	(361)
第二十三章 “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方法论.....	(364)
一、凯恩斯学派的反对者	(364)
二、货币主义者的办法	(366)
三、供给学派的方法	(370)
四、新自由主义者的方法	(374)
第二十四章 计量经济学对数学方法的运用	(379)
一、数理经济学的扩展	(379)
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主要程序	(381)
三、克莱因的经济周期分析	(386)
四、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	(391)
第二十五章 新制度学派的方法论	(391)
一、与“主流派”相对立的反对派	(391)
二、加尔布雷思“演进的、整体的”方法	(400)
三、缪尔达尔的跨学科研究	(405)
第七篇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410)
第二十六章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初阶段的方法	(412)
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成立的争论	(412)
二、以论证政策为主的早期方法	(415)
三、对科学抽象法原则的确认和初步贯彻	(419)
第二十七章 苏联五十年代《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 方法	(426)
一、斯大林的指导作用	(426)
二、“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尝试	(430)
三、力求运用科学抽象法	(434)

四、《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的特点和缺陷	(436)
第二十八章 60年代以来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方法论的进展	(440)
一、关于方法论的讨论	(440)
二、查果洛夫体系	(446)
三、鲁米扬采夫体系	(447)
四、鲁缅采夫体系	(451)
第二十九章 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	
论	(457)
一、康斯坦丁内斯库的体系	(457)
二、安道尔的体系	(460)
三、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的方法	(462)
四、科拉奇——弗拉卡列奇体系	(466)
五、乔西奇体系	(469)
第三十章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	(473)
一、五、六十年代的有关讨论	(473)
二、上海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477)
三、近年来有关方法和体系的讨论	(480)
四、北方本和南方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方法 和体系	(485)
结束语	(491)

导 论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主要的社会科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但政治经济学史绝非经济史机械的、单纯的反映，它本身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既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也受研究者方法的制约。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方法，方法论史与政治经济学史是同步的。现代社会对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适应这种要求，研究各种时代性课题的关键，又在于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论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探讨方法论史是研究科学方法论的必要内容，也是解决当代政治经济学发展重大问题的内在条件和必要前提。

一、方法论在政治经济学 发展中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以历史的经常变化的社会经济过程作为自己的对象，这就决定了这门科学必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而发展。从重商主义到现代，几百年的时间内出现了几十个学派和数百位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在他们以及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和经济活动家们的努力下，政治经济学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由单纯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从贫乏到丰富，成为社会科学中最早出现、也最为成熟的学科。之所以有这样的发展，仅以客观对象的变化是不能得到说明的。为什么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学派？甚至在同一个阶级中还会出现若干政治经济学派别？这里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方法论上的差别。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内在条件，各学派，乃至各著作家都有自己的研究

方法。方法上的差别和演化，使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得以发展，各个学派的批判继承关系，也能从方法论的历史演化中得以说明。

概括起来说，方法论在政治经济学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法论的发展程度是学说体系发展的条件；二、各个时代不同学派批判继承的重要原因；三，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各派别既有差别又有统一的根据。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和论述体系的理论概括。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派别都有自己的方法论，其中有的是由该学派的代表人物系统论证的，有的则贯彻于其学说体系中。研究方法是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在对客观经济过程的反复研讨中，形成自己学说的途径和程序；论述体系是研究方法的表现形式，是对已初步取得的理论成果进一步完善和论证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思维层次和步骤。任何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重要派别，它们学说体系的形成，都是其研究方法运用的结果。从一般意义上说，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是把各种现象材料加工成一定理论性的体系，进而说明这些现象。但方法的区别，又使研究者在取材的角度，收集材料的深度和广度，加工材料的思维形式和思维过程，乃至论证及表述的形式方面各有不同，这样，就必然造成学说体系上的差别。法国重农学派的魁奈与英国的配第，几乎处于同一时代，又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但前者注重分析和演绎，后者注重归纳，他们在学说体系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以后的李嘉图与萨伊、西斯蒙第与马尔萨斯等，都因方法上的差别而形成学说上的差别。最为突出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庸俗政治经济学方法上的差别，以至形成了对立的两大学说系统。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不断演变、丰富和发展的。从重商主义者的经验总结法到斯密的二重方法论，是一个大的飞跃，而由斯密所开始的抽象法与现象描述法的各自系统化和全面发展，又是一大飞跃，随着方法上的进展，也就形成政治经济学学说体

系的演进。这是方法论在政治经济学史上作用的第一个方面。

方法论在政治经济学史上作用的第二个方面，是各个时代不同学派批判继承的重要原因。几百年来，政治经济学史上所出现的众多学派，虽说在体系上有重大差别，但又有着内在的联系，批判和继承，沿革和演化。在后的学派对在前学派的批判和继承，是以经济矛盾的发展为根据的，但仅有此客观的基础，并不能形成学说上的批判和继承，还必须有相应的方法上的转变。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来，可以分为若干小的发展阶段，如商业资本或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产业革命时期，机器化大生产时期，垄断时期等等，在这些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经济学派别出现，既便同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后起的也必然要对前人的学说进行批判，何况还存在着对立的阶级，阶级的利益和时代的差别，要求批判以前的学说，而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国家也有其冲突，这也是产生批判他人学说的条件。要批判前人和别人 的学说，也就要采取新的方法，不仅在研究的角度、材料的取舍和加工，在思维形式运用的程序、论证的方式上，都要有所改变。只有这样，才能指出别人学说中被自己看成不合理的地方，才能论证自己的新观点。但不论怎样全面而彻底的批判，又都不是单纯的抛弃或全盘否定，而是批判中包含着继承。之所以有批判，在于方法论上的区别，之所以有继承，又在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有其总体上的一般性。正是由于方法论上的区别和一般性，才有政治经济学在批判继承中的演化和发展。

不论政治经济学史有多少学派，它们的差别以至对立是多么大，它们又都有其统一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都属于政治经济学这一总的学科，它们的各种概念和体系尽管在定义和论证上不尽相同，但依然有内容上的相通之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各学派的批判和继承关系。造成这种既有差别又有统一性的客观基础，是政治经济学对象上的统一性，而其主观上的根据，就在于方法上的区别和一般性。这里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马克思主义系统中

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们的对象有质的差别，因而在方法上也要有相应的特点，但从原则上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依然是科学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形成的。科学抽象法是维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依据。不仅如此，就是在同一领域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方法论的这种作用，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帝国主义的研究，特别是现代各社会主义国家分别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都贯穿着统一性，其根据就在于科学抽象法的原则，而其差别又在于对科学抽象法的不同理解和运用。这种作用在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以及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各派别之间，也都是明显的。

从政治经济学史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充分地认识到方法论的重要作用，由此能够得出一个明确的推论：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方法论的作用依然是极重要的，对于我们正从事现实研究，被各种疑难所折磨，苦于探寻出路和答案的人来说，几乎谁都会意识到方法论的这种重要作用。

二、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演化的历史阶段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发展的，这种演化分为若干阶段，在各阶段上又有不同的学派。对方法论的历史研究，首先就要明确这些阶段的划分及其演化的过程。

划分方法论史的历史阶段，与政治经济学史的阶段划分大体一致，但由于方法论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其历史阶段的划分，也必须充分考虑这种特点。为此，我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分为以下五个大的阶段：（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二）早期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三）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确立；（四）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个系统的方法论的对立与发展；（五）现代资

产阶级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这五个阶段中，第一个阶段的时间最长，大约有二、三百年的时间，但内容比较少；以后的四个阶段，都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内容很丰富。在第一阶段上，基本上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系统，而在以后的四个阶段中，则有不同的学派出现，各学派往往是穿插于两个阶段，或者同一阶段存在若干学派，这样，在划分阶段时，又必须在考虑时间界限的同时，注意这些学派相互间的关系及其自身的演化。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为起始的，它的标志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历史渊源的，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形成和论证中的方法，这包括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及他的学生色诺芬和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们在提出自己的经济思想过程中的方法，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最初的渊源；中世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经济思想是阿奎那的“圣典主义”，他的演绎法是最为典型的主观主义方法；重商主义者在方法上是反对阿奎那式的“演绎”，注重经验总结的，不论从时间还是从内容上看，重商主义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来源。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开始阶段是受两种哲学方法论制约的，即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理性主义，受它们各自的影响，英国的配第注重归纳法，而法国的重农主义者，特别是魁奈则注重理性分析和演绎。斯密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二重方法论，并以此建立了第一个系统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但斯密方法论的二重性又开启了后世方法论的分化和各自的发展。他的方法导引出四个门派：李嘉图、西斯蒙第、马尔萨斯、萨伊，他们都是斯密学说的传人，且分别代表不同的阶级。其中使用并发展抽象法的，是李嘉图和西斯蒙第，虽说他们之间有很大差别和矛盾，但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的代表，他们的著述主要在19世纪最初的一、二十年。

在这一、二十年中，也是马尔萨斯和萨伊活动的时期，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早期庸俗政治经济学交错的时期。严格说来，马

尔萨斯并不属于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但他是地主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而且其方法是取自斯密的现象描述法的，所以我们仍将他归入第二阶段。马尔萨斯的主要作用，就是对李嘉图的方法和学说进行批判，从而促进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斯密现象描述法最主要的传人是萨伊。萨伊把现象描述法与抽象法分离，并使之系统化。而受到马尔萨斯冲击的李嘉图的门人詹姆士·穆勒和麦克库洛赫，又只能从萨伊那里接受现象描述法。这样，抽象法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就已被放弃，虽然以后也有人称自己的方法为“抽象法”，但已不是斯密、李嘉图的本意了。李嘉图学派解体以后，是庸俗方法论的大发展时期，从西尼尔、巴师夏到约翰·穆勒，庸俗方法论达到一个新的系统。在这个阶段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德国的历史学派，它虽然在经济学说上没有什么创新，但以自己独特的“历史的方法”，在方法论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开创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支流。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反对庸俗方法论的过程中建立的。这个创立过程大约 30 年（19世纪 40—60 年代），其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方法上没有明显发展，除戈森提出萌芽形态的“心理原则外”，并没有新的方法论出现。马克思是在深厚的哲学基础上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他对德国古典哲学作了深入的批判，同时继承了其中的合理成份，形成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此基础上，他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专门研究，经过 30 余年的时间，确立了科学的抽象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形成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 1843 年到 1849 年，二是从 1850 年到 1862 年，三是 1863 年至 1883 年。从第一个阶段，马克思就以科学抽象为原则，并提出了“异化劳动假说”，第二阶段的特点是从异化劳动假说向剩余价值理论的过渡，科学抽象法得到进一步发展，第三阶段是科学抽象法的确立阶段，其主要成果就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成熟。在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确立的三个阶段中，恩格斯都起着非常重要的

的作用，对此，我们将专门探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大转折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并逐步占统治地位。对这个时代的特点，马克思主义者力求从科学抽象法揭示其规律，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考茨基、希法亭，卢森堡，以及俄国的布哈林，都在这方面作了贡献，虽然他们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存在缺陷，但毕竟是科学抽象法的运用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不同程度地传播了马克思的方法论。这个阶段中，对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发展贡献最大的是列宁，他不仅运用这个方法揭示了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规律，而且揭示并论证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和基本特征，并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做了一些尝试性探讨。科学抽象法的发展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对立的，在这一阶段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希法亭和卢森堡曾对庞巴维克等的方法和学说进行批判，同样的，几乎所有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也都对马克思的方法论作了批判。这一阶段庸俗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心理原则”的系统化和数理学派的兴起，以及新历史学派到制度学派的转化。以系统化的“心理原则”为基础的方法论是在奥地利学派中的门格尔和庞巴维克那里开始的，数理学派的代表杰文斯和瓦尔拉也对之有开创性贡献，这种方法论在马歇尔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主流派”的方法论。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除杰文斯和瓦尔拉之外，还有帕累托。他们也强调“心理原则”，但认为方法论的主体应是数学方法，为此他们着重以各种数学公式论证他们认可的庸俗观点，并建立相应的论述体系。新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非正统派”，他们承继历史学派的原则，强调特殊的历史条件，强调对各种社会因素的归纳和描述，并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某种改良设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方法论是与正统派相对立的，但又是其必要的补充。

现代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资产阶级那里是以本世纪30年

代的“凯恩格革命”开始，在无产阶级这里则是从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的。所谓“凯恩斯革命”，特点在把“心理原则”扩展到对某一国家经济的总量分析，而不是象马歇尔那样集中对个量经济的分析，并据此提出了国家干预的主张。凯恩斯这一脉，成为英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统”，近来它已分化为两支，一是英国以琼·罗宾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二是美国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它们都自称“正统”，并为此而争论不休，前者坚持凯恩斯的纯“宏观分析”，后者则要“综合”进马歇尔的一些方法，以“修正”凯恩斯主义。与凯恩斯一派唱对台戏的，既有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者，又有以加尔布雷思为首的新制度学派，它们在方法上都有一些新特点。此外，从数理经济学演化出来的经济计量学则将数学方法提到一个更高程度，这在方法论史上也有其新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比较曲折缓慢。先是二、三十年代以布哈林为首的“取消论”占主导地位，这时方法的重点放在论证政策上。30年代以后，虽然明确了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论证政策依然是方法的主要内容。到50年代初，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以后，才标志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研究的开始，方法上的探讨也逐渐增多。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苏联和东欧各国，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其基本的原则还是如何遵循科学抽象法，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尚处于初级形态，它的各种矛盾还未充分暴露，而且对科学抽象法的理解尚不深刻、不全面，加上多年来教条主义学风的影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还是不成熟的，因而未能建立起比较科学的理论体系。虽然如此，但几十年的探索，却也为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提供了必要前提。

上述五个阶段就是本书所要探讨的内容，由于第四、五两个阶段明显地分为两大系统，所以将其各自分为两篇，前三个阶段则自成一篇，全书共由七篇构成。我力求做到的，就是通过这七